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85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劉宗周年譜

史可法年譜

張溥年譜

吳梅村年譜

魏叔子年譜

呂留良年譜

梁質人年譜

姚名達者

楊德恩著

蔣逸雪編著

馬導源編

溫聚民著

包賚著

湯中著

上海書店

歷史、地理類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影印

序

凡研究近代史的人，都不會忘了這位民族思想的重要人物呂留良。不過研究的人雖多，而真能直接追尋的似乎覺得很少。據我個人淺見所及，却祇有二個，一個是徐珂，另一個是梁啓超。其餘的都是間接的了。直接研究呂留良的人所以不多的原因，並不是他不值得研究的價值問題，而是『呂案』鬧的時間太久（自雍正六年至乾隆三十二年），空間太廣（牽連至七省），這一派的著作幾乎燒燬淨盡的緣故。

可憐得很，徐珂梁啓超二先生雖只研究過呂留良，可是他的頭幕終未給他們揭開。徐珂的清稗類鈔說：『自以爲淮府儀賓之後，追思明代。』這分明是說他因淮府儀賓之後，才來反清。他是淮府儀賓之後是不錯的（他的祖父煤尚淮莊王的女兒城南郡主），但我覺得淮府儀賓之後與他的民族思想是沒有好大的關係。明朝亡國是他十六歲時的一年，如其因淮府儀賓之後而反清，當那故國新亡的時候，應該有激烈的表示，但在明朝亡國的初年很少見到他民族思想的表示，而他

在二十五歲的那年還在清政府的統治之下考過秀才（生員），益發可以知道淮府儀賓之後和他的民族思想是沒有好大的關係。梁任公（啓超）先生的清代三百年學術史說他是道學家——朱子學，是時文評選家，已不妥當，甚至於說這一派都沒有大學問，那就未免犯了忽略原書的毛病。其實他的尊朱和評選古文制藝文都有很深刻的含義，我們萬不可犯了『接着封皮當信讀』的謬誤。他的尊朱並不是同陳白沙一流的靜坐爲尊朱，他的評選制藝也不像馬二先生一樣爲制藝而評選制藝。陳白沙的尊朱是以朱子爲目的，馬二先生的評選制藝也是以制藝爲目的；他的尊朱和評選制藝不過是一種巧妙的方法便利的手段。但這些決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在於『恢復民族』上。這是他和陳白沙馬二不同的地方。故他答許力臣書云：

某僻陋無似，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呂用晦文集卷二）

與施愚山書云：

某陸伏荒陬，日趨卑陋，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謳，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慊然也！（同上卷一）

選文固不是他的目的，就是尊朱也不是他的目的。答潘用微書云：

某村南之鄙人也。……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面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同

上卷一）

『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信孔孟』這是一種歸納（Induction）的說法，可見他的終極信仰是在孔孟而不是程朱，程朱不過做個嚮導而已。他的尊信孔孟也不同于一般人的尊信孔孟。一般人的尊信孔孟是在倫理學方面的仁義葬倫上和哲學方面的性理等，他却是在政治學方面的『夷夏之防』這是他和人家尊孔的不同之點。一個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的人，斷定他是評選家是冤枉；一個不講心性哲理的人，斷定他是道學家也是冤枉；一個為恢復民族運動言之成文行之成理的人，說他沒有學問，益發是冤枉。

十七世紀的漢民族和滿洲民族接觸，在武功方面是完全失敗了，明朝是勝國了。這時的民族爭扎，除了學術思想是再找不到更好的利器，晚村（呂留良）先生便是應時而起的一個，而且是

一個民族思想運動的代表者。當時站在這條戰綫上的人，比他較先輩的有顧炎武、黃宗義、張履祥等，比他較後輩的有全祖望等。這班人雖都是灌注民族思想到民間的巨子，可是他們看到時勢已不可為，都改爲獨善其身，僅作消極不合作的抵制，而晚村先生除與他們取同樣的態度拒絕清政府博學鴻詞山林隱逸等徵聘外，還借評選制藝文字作積極的宣傳。

黃梨洲（宗義）張考夫（履祥）陸稼書（隴其）都是晚村的朋友，而且都是尊朱關王者。黃梨洲後來和晚村不睦了，他二人的友誼究竟爲什麼破裂我們實無法知道，但他們破裂的痕跡在高且中墓誌銘的爭執上是完全顯露了。陸稼書和晚村在形跡上並不見得密切，不過因二人都尊朱關王，每每得到聲氣的相應。晚村和陸稼書有個相似之點，即他二人都認定『朱子學』是孔孟的門戶，『陽明學』是亡明的禍胎；但他二人也有一個不同之點，晚村以爲既信孔子，便該隨處實踐他的夷夏之防。故與施愚山書云：

先生之詩，所謂子女玉帛，羽毛齒革，君之餘波足以及天下。何以益之無以，則六經之義乎。
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生試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此如

風轉帆回，滿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飄泊狂濤時，實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呂晚

村文集卷一）

詩寫子女玉帛羽毛齒革本來是極平常的事，但在晚村看來這種詩直可不作，要能風轉帆回照着詩之義即春秋之義去寫才能百貨到家。這種言行合一的精神是晚村的特點。陸稼書就不是這樣，他以爲做人只要『存心利物』就是，也不一定親冒鋒鏑。走上冒險的路上。故他祭呂晚村先生文云：

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所不能盡合於先生者，程明道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耿耿，橫於胸中，遂與先生出處殊途。（三魚堂文集卷十）

因爲晚村是一個實踐民族運動者，所以他不接受清政府的博學鴻詞和山林隱逸，陸稼書是一個保守溫和者，故去做清政府的縣長。這是他二人不同之點。

我們若以實踐民族運動者形狀呂晚村，保守溫和者形狀陸稼書，那沒，張考夫可說是一個自

做工夫者。他似乎覺得時勢已經如此，一不慎言，非單無益於人，而且容易惹禍，不如自做工夫，到能獨善其身。晚村處在清政府積威之下，大吹大擂宣傳其民族思想，終其身未曾取禍，實在不少靠着張考夫慎獨的掩護。張考夫與呂留良書云：

春間所商『名臣言行』之錄，輾轉思之，有未易從事者。非特耳目所及百無一二……而三百年間記載，大都失實，不可信於後世，國史家乘一耳……更有難者，『東事始末』是也！

種種三思，未得其妥。若欲旁搜廣覽，發潛導隱，無論海內文集難以備收，兼自賤疾至今，心力衰短……知小謀大，妄希表見於斯世，真所謂徇外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屣也。（張楊園集卷七）

他認『東事始末』是一樁難事。牠的難是難在一個被征服者記載戰勝者的情事容易惹禍；徇外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屣』是充分表顯他自己的意志在於慎獨，在於自做工夫，不願向外有所表示。這種不願向外表示的意志恰恰和晚村到處宣傳的意志相反。但是他的不向外表示的意志確幫了晚村不少的忙。如晚村在金陵的時候，他怕晚村直率惹禍，一則寫信去囑晚村少說話，再則寫

信去促晚村提早回家。這些都是他對晚村直率宣傳的教濟。

清代的『文字獄』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有關於民族思想的，也有關於王室內鬨的，有關於貧士貪圖利祿的，也有關於官吏趨奉太過的。如晚村先生等當然是關於民族思想，至於曾靜的上書，雍正便疑他是王室的內鬨了，嚴誦的請立正宮，乾隆也疑他是出於王室的主意。軍機處檔寄舒赫德等將嚴誦審明具奏正法案云：

嚴誦乃微賤秀民，何由知宮闈之事……其中必有向其傳說之人，不可不澈底嚴究……至搜出紙片內有遞四阿哥啓帖一紙，尤爲可異（清代文字獄檔）

乾隆疑嚴誦上書是出於王室，出於四阿哥，正同於雍正疑曾靜上書是出於阿其那允禩等一樣。雍正七年諭云：

（東華錄）

曾靜僻處山村，爲流言所惑，其捏造謬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

文字獄所以時間鬧得這樣久，空間鬧得這樣大，其實還不僅是滿漢的民族問題，而其內幕還有王室互相爭奪的隱情。

文字獄中固然有不少有價值的事情，但也有不少無聊的胡鬧。如一個春米的丁文彬寫了一部時憲書，自己單相思爲衍聖公的女婿，待衍聖公故後，卽位爲王，國號「大夏」，年號「天元」。（見清代文字獄檔）像這類瘋人做皇帝的事，竟會像煞有介事認真辦理，那不是極好笑極無聊嗎！嚴譴的供詞也說：『我要投遞摺子緣故，一則可以得名聲，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像這樣的案子也要像煞有介事的辦理，那不是無聊嗎？還要好笑的有山西巡撫巴延三，他看到李掄元的父親的墓誌於「考」字上加「皇」字，認爲是擅用皇字，他奏了一本，要將李掄元和撰寫墓誌的人一律治罪。後來還是乾隆的上諭說：『皇考之字，見於禮部，屈原離騷及歐陽修瀧岡阡表，俱曾用之……不得謂之叛逆。』巴巡撫接到道道上諭總算饒了李掄元等的大逆不道，可是官架子還是要擺，他的奏釋放李掄元等的摺子說：『李掄元等俱行釋放，仍敬謹將現奉上諭明白宣示，俾首省士民咸知我皇上大公至正……激發天良，互相懲勸，不致拘泥經義，援引錯誤，以昭敬

謹。」這位巴巡撫的奏摺，亂拍馬屁，難怪乾隆的硃批罵他：「彼既迂腐，而汝之不讀書及幕賓之不曉事，又可知矣。」（見清代文字獄檔）

犯文字獄案子的人雖多，我們想在文字獄當中找出一個言之成文行之成理能代表文字獄這筆大案的人我翻來翻去覺得只有呂晚村一個，他是把握住孔子的夷夏之防，他利用評選制藝，使民族思想普遍到一班青年的士子，他激頭激尾至死不衰幹這恢復民族的工作。因為他有這樣的毅力，所以他的思想徧天下了。清政府的威力雖能毀他的屍，但他的精神早已傳遞給抗疏派的唐孫錡齊周華等和下層社會的「反清復明」的洪門會三合會了，也傳遞給一百五十年後的石達開了。石達開的詩云：

我志未離人亦苦，

東南到處有啼痕！

他的志是什麼呢？我們正要讀他答曾國藩書便知道了。書云：

足下固曾讀中國聖賢書者夫春秋「夷夏之辯」，嘗亦熟聞之。自昔王猛輔秦，猶未至彰

明寇首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諡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慚德。而足下喜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爲（謂）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頌爲正統，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也。（石達開詩鈔和太平天國詩文集）

人們的思想往往會隨着時代環境的變遷而改變。諸葛亮自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中央權主義（Centralism）者管仲，又自比以燕爲中心下齊七十二城的地方分權主義（D. centralism）者樂毅，便是一例。揚雄自悔少作，朱熹有晚年定論，都是時代環境變遷而思想隨之改變之明證。年譜是絕好的記傳文學。我們要澈底明瞭某一個人的思想變化來龍去脈的軌跡，年譜便是最好的把握。因爲牠是以年爲綱，以事爲緯，分年敘事，最能清晰詳盡。徐珂說晚村『自以淮府儀賓之後，追思明代』便犯猶把握時間空間——年譜——的毛病。如其把握住這些，便曉得他的民族思想不是淮府儀賓的門閥關係，而是他三十歲以後交結了與清軍抗戰的義勇軍領袖黃宗羲兄弟和高且中等一班人的關係了。晚村先生的頭幕所以始終未給人家揭開，實在沒有一

本較詳盡的傳記確是一大原因。我很願望由這本小冊子引起大家切實研究的興趣。使得晚村的學術思想有一天大白於世。

這本小冊子編成後，我的朋友孫虹先生，王久安先生曾替我校閱一遍，王久安先生的訂正尤多，我是很感謝他們。最近我將這本小冊子寄給胡適之先生，想他給我一點批評。但他正忙着預備至美國出席太平洋學會，無暇及此，頗爲遺憾！他在臨走的前一天寫信給我說：『呂留良年譜序實無工夫動手做，連想着一遍的工夫都沒有……』待有機會時仍盼胡先生批評外，還盼望海內外的學者時常給我一個教正。

包 賚

二五，七，廿九於南京清涼山。

編輯例言

末。
本書共分四編，第一編家世，第二編世系表，第三編年譜，第四編『文字獄』中的『呂案』始末。

這本小冊子的呂氏系年材料，大抵以呂晚村文集、續集、家訓及晚村先生的兒子呂葆中做的行略爲根據，旁探張楊園集、三魚堂集、黃葉村莊詩集、南雷文定……等書爲佐證。張考夫（履祥）等都是晚村先生的朋友，故這些材料非但可靠，而且每每要藉此等書籍相互參校才能得到年代的精確性。如不讀黃葉村莊詩集，決不會明瞭晚村和吳孟舉（之振）定交的時期，不讀南雷文定，決不能明白晚村和黃梨洲（宗義）交離的歷史，不讀三魚堂集也不曉得晚村和陸稼書（隴其）相遇的時地和學術主張的異同。尤其重要的是張楊園集。這書不光是能證明晚村和張考夫相交的時期，學術的異同，而晚村家中的子姪兄弟許多事情都靠這書零星記出，晚村二哥四哥的死葬年代，非這書是萬不能決定的。此外石門縣志等對於他的家世有不少的幫忙，東華錄等對於『文

字獄』中的『呂案』有很詳盡的記載（呂案部份，現在故宮博物院已出有清代文字獄檔案呂案專冊，較東華錄尤爲詳盡。）

年譜是賬簿式的記載，雖不失其真實，但未免覺到枯燥，這是一般年譜的缺點。這本小冊子爲避免枯燥起見，有時竟將某事的顛末放在他最有關係的一年。如蓄研事放在他十六歲——清順治元年——年裏，與黃梨洲的爭論學術邪正事放在四十二歲——康熙九年——年裏，他的整個民族思想——夷夏之防——放在四十五歲年裏，使得某事的眉目具體的敘說，而免了賬簿式斷片枯燥的毛病。

呂晚村的材料最不易找，如南雷文定根本見不到呂晚村三個字；康熙本的黃葉村莊詩集有和晚村往還的詩，同治本都沒有了，就是幾首極平常的詩，遇呂晚村名字都改用空方框；張揚園集對呂晚村父子的名字也改用墨板；今本三魚堂集已見不到和晚村有關係的文字，就是康熙本也刪去了這幾篇有關係的文字，空着行頁了。這本小冊子搜到的材料，都照原書，方框的仍用方框，墨板的仍用墨板，讓讀者自見。

關於呂氏的書，散落公私藏書家的想來不少？將來如有發現，當極歡迎參校。惟編者現在目力所及，僅能止此，望一漏萬，請讀者原諒。